



随身听名著

随书附赠全书演播光盘 轻松拷贝MP3文件 随时随地听名著



随身听名著

[苏] 高尔基 著
王宏容 译

我的大学

My university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三部，完成于1922年。小说描绘了阿列克谢十六岁至二十岁在喀山的生活。他抱着上大学的希望来到喀山，但很快就意识到穷人上大学仅是幻想。他为了谋生，去当码头工人，在面包作坊里干活……。残酷的生活使他最为深切地体会到人性被压抑直至毁灭的痛苦，并能自觉与工人群众一道为生存和解放而斗争。

农村读物出版社



随身听名著

我的大学

世纪博宇 主编

[苏] 高尔基 著 王宏容 译

农村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大学/ (苏) 高尔基著; 王宏容译. —北京: 农村
读物出版社, 2007. 9

(随身听名著)

ISBN 978-7-5048-5046-1

I. 我… II. ①高…②王… III. 长篇小说—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2872 号

责任编辑 育向荣

出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720mm×960mm 1/16

印张 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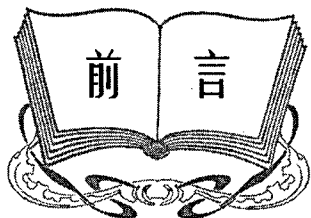
字数 137 千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册

定价 14.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高尔基(1868—1936)，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政论家和文艺批评家。高尔基出身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下诺夫戈罗德市，父母早亡，寄养在外祖父家，十余岁出外独自谋生。19世纪末开始从事创作，作品多反映俄罗斯下层市民的痛苦和欲望。20世纪初，他参加革命运动，创作了《母亲》这一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作。十月革命后高尔基的思想一度出现波动，列宁的被刺促使他重新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边，写出了一系列深刻剖析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品，例如长篇小说《阿尔塔莫夫家的事业》(1925)，史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等。他的作品在对社会心理及底层人情的揭示方面，贡献尤为突出。

《我的大学》是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三部，完成于1922年。小说描绘了阿列克谢16岁至20岁在喀山的生活。他抱着上大学的希望来到喀山，但很快就意识到穷人上大学仅仅是幻想。他住在贫民窟里，为了谋生，去当码头工人，也曾在面包作坊里干活。残酷的生活现实磨炼了他的品格，使他深切地体会到人性被压抑直至毁灭的痛苦，并能自觉与工人群众一道为生存和解放而斗争。由大学生和满怀革命热情的青年组成的秘密小组成了阿列克谢的“社会大学”。总体而言，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19世纪80年代沙俄复杂的政治、思想背景，尤其是民粹派思想对阿列克谢的深刻影响。他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却成为了积极探求生活真理的不妥协的青年。



终于，我去喀山大学学习了^①，就这么回事儿。

一个叫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的中学生激起了我上大学的念头。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青年，长得也很英俊，一双眼睛像女人般温柔可爱。他那时跟我住在同一幢楼里，因为常见我手里拿着书，就留意起我来，我们就这样相识了。没多久，叶夫列伊诺夫竟总想让我承认这一点：我有“研究科学的特殊才能”。

“你天生就是块搞科学的料。”他说道，潇洒地甩甩他那马鬃般的长发。

那时我还什么都不懂，就算是只家兔，也能服务于科学。可叶夫列伊诺夫成功地使我相信：我这样的青年正是各个大学所需要的。自然而然地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②的掌故又被搬了出来。叶夫列伊诺夫又说，如果我去喀山的话，可以住在他家，用秋冬两季学完中学课程，再“随便”把几门考试应付过去（他就是这么说的：“随便！”）。到了大学里，我就可以领到助学金，只要五年时间，我就能成为“学者”了。这一切在他看来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那时的叶夫列伊诺夫才十九岁，又有一颗善良的心。

他一考完试就回家了。两周之后，我也跟着上了路。

年迈的外祖母为我送别时，劝告我说：

“你可别再对人乱发火了！你总爱发火，变得又凶、又傲慢！这都是从你外祖父那儿学来的，可你看看你外祖父，成了个什么样子！这苦命的老头子，活了几十年，竟变成个傻子。你得记住：上帝不评判人的对错，魔鬼才专爱此道！再见啦，唉……”

几滴无奈的眼泪沿着她松弛的面颊淌了下来。她抹了抹，又说道：

“咱们再也见不着啦！你这不安稳的孩子，要远走高飞啦，而我呢，却时日不多……”

这几年来，我常不在亲爱的外祖母身边，甚至很少见到她。想到此刻就要同她诀别，同这个和我血肉相连、善良体贴的老人诀别，我一时也不禁悲从中来。

我站在船尾，一直望着她，她就站在码头边儿上，一手画着十字，一手不住地拿起那条旧披肩的角儿，擦自己的脸和那双总是流露着温柔和慈爱的黑眼睛。

于是，我来到了这座半鞑靼式的城市，住进了一所平房中的一间小屋。这所平房孤零零地矗立在一条窄巷尽头的土坡上。房子其中的一堵墙正对着一片火灾后的荒地，荒地上杂草丛生；一堆砖瓦房舍的废墟，隆起在苦艾、牛蒡、马蓼的杂草丛和接骨木的灌木林里，废墟下面是个大地窖。游荡的野狗就生在那里，也埋葬在那里。我绝不会忘记这个大地窖，它是我上过的第一所大学。

① 大约在1884年夏末或秋季。

② 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俄国著名学者、诗人。



叶夫列伊诺夫的妈妈，仅依赖一点微薄的抚恤金勉强度日，拉扯着两个儿子。刚开始到他家的几天，我就常看见这个面色苍白的小个子寡妇从市场回来，带着无可奈何的忧伤，把买来的东西放在橱柜上，琢磨着如何解决眼下的问题：就算抛开自己不算，又怎样用这么一小块肉做出一顿丰盛的美餐，让三个健壮的小伙子吃得满意呢？

她的话很少，灰蒙蒙的双眼流露着一种无奈而温和的坚强，仿佛一匹已经声嘶力竭的母马，明知自己再也无法把车往坡上拉动，却仍然在拼命挣扎。

来到她家第四天的一大早，我去厨房帮她洗菜，她的孩子们那时都还没起床。她小心翼翼地低声问我：

“你上这儿来想干什么？”

“读书，上大学。”

她双眉往上一挑，脑门上发黄的皮肤也跟着往上一皱，一不留神被菜刀割了手指头。她忙吮住流血的伤口，在椅子上坐下，但又立即跳了起来，说道：

“噢！见鬼……”

她把受伤的手指用手绢包起来，称赞我说：

“你削土豆倒挺利索的！”

哼，这还不简单！我于是跟她讲起了在轮船上帮厨子干活儿的事。她又问道：

“你以为凭这么两下子，就能上大学了吗？”

那时的我，还不懂什么叫开玩笑。我把她的问话当了真，就把我的行动计划对她详细地讲述了一遍，还说，只要这样按计划行事，科学殿堂的大门就会为我而敞开。

她叹了口气叫道：

“噢！尼古拉！尼古拉……”

这时候尼古拉进厨房洗脸来了。他睡眼朦胧，头发乱蓬蓬的，但还像往常一样兴高采烈。

“妈妈！如果能包顿饺子吃多好呀！”

“嗯，好吧。”妈妈答应道。

为了让自己的烹饪手艺露露脸，我说道：“这点儿肉对于包饺子来说，实在不合适，而且太少了。”

这句话惹得瓦尔瓦拉·伊凡诺夫娜火冒三丈。她用尖酸的话讽刺了我几句，害得我连耳根都涨得通红。她把手里的几个胡萝卜朝桌子上一甩，扭头出了厨房。尼古拉朝我使使眼色，对此解释道：

“生气啦！……”

他在凳子上坐下来，又接着跟我说：“女人总是比男人更情绪化。她们的天性使然。一个很有名气的学者，好像是个瑞士人，曾经不懈可击地论证过这个问题，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这一点上也说过类似的话。”

尼古拉很喜欢教导我，因而不放过任何一个合适的机会，向我灌输一些生活的基本常

识。对这些话，我也听得非常认真。后来，我竟然把佛克、拉罗士佛克和拉罗士查克林三人混为一谈。我也搞不清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砍了杜模力的头呢，还是正好相反？这个招人喜欢的青年，诚心诚意地要把我“教育成人”，同时满怀信心地保证这一点。但是他抽不出时间，而且也不具备好好教我的条件。在那种青年人的轻率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气影响下，他看不到他母亲在怎样为维持家庭的生活而精疲力竭、费尽心血地操劳。他弟弟是个孤僻迟钝的中学生，对此就更无法感受了。而我却早已看透了这个女人那套精妙的厨房里的经济和化学玄理。我清楚地看到她如何应对自如：每天都得想办法哄住自己孩子的肚子，又要养活我这个相貌平平、举止粗鲁的异乡人。当然，每当我拿到分给我的面包时，它们都像重重地压在我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开始想去随便找些什么活儿来干。为了不待在家里吃闲饭，我每天一大早就出门，遇上天气不好时，就躲进荒地上的那个大地窖，坐在里面倾听飘摇风雨，闻着那些死猫死狗的恶臭。我终于明白：上大学——那无非是个梦罢了。如果当初去了波斯，也许比来这儿要明智些。这样想着我就幻想自己成为了一个白胡子的法师，能让谷子长到苹果那么大，能让土豆长到一普特重。总而言之，我为这块土地——这块还有无数像我一样穷困潦倒之人的土地——设想出了许多有益于民的善举。

我已经学会了对奇遇冒险和丰功伟绩的幻想。在生活陷入困境时，这些幻想极大地帮助了我。而因为艰难的日子太多，我也变得越来越会幻想。我并不奢求别人的援助，也不等待时运的降临，在磨难中，我的意志变得顽强起来。生活的条件越是艰苦，我就觉得自己越发坚强，甚至越发聪明。我很早就理解到：人是在与周围环境的抗争中成熟起来的。

为了不至于挨饿，我常去伏尔加河的码头，要想上那儿挣到十五至二十戈比的工钱还是不难的。在那儿，与那些装卸工、流浪汉和无赖混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块被投进通红炉火的生铁。每一天都被烙下许多新鲜、炽热的印迹。那些欲望裸露、禀性粗野的人，旋风般地在面前转来转去。我喜欢他们愤恨现实生活，嘲笑、敌视世间的一切，对自己无牵无挂的态度。我过去所经历的生活，使我对他们怀有一种亲近感，产生出一个想要加入他们那个充满着刺激和力量的圈子的愿望。我读过勃莱特·哈特的作品和不少“低级趣味”的小说，因而更激起了我对生活在这个圈子里的人们的同情。

有一个职业小偷，名叫巴什金，曾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如今潦倒不堪，还染上了肺病。他循循善诱地开导我：

“你怎么跟个姑娘似的，总是那么畏首畏尾？是怕人说你不安分守己吗？安分守己对姑娘来说，是她一生的财富。可那对你而言只是个枷锁。公牛倒能安分守己，那是因为它整天只吃干草！”

巴什金长着一头棕色头发，脸上像演员一样，刮得光光的，身材矮小，动作敏捷轻巧，就像一只猫。他把自己看做是我的老师和保护人。我看得出，他真诚地希望我能有所成就并赢得幸福。他很聪明，读过许多好书，最推崇的是《基督山恩仇记》^①。

① 《基督山恩仇记》：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作品。

“这本书中有理想，又有真情。”他说。

他喜欢女人，一谈起女人总是津津乐道、神采奕奕，那虚弱的身体也一阵阵痉挛起来。这种病态的痉挛让我很感嫌恶，但我还是饶有兴趣地听他讲，觉得他的话美妙动听。

“女人，女人！”他抑扬顿挫地说道，黄色的面孔泛起一片潮红，赞赏的目光在两只乌黑的眼中闪烁，“为了女人，没有什么我不肯干的事。女人仿佛就是魔鬼，毫无罪孽可言！世上再没有什么事比跟女人恋爱更甜蜜了！”

他很有讲故事的天分，能轻而易举地为妓女们编出一些歌唱爱情的感伤动人的小曲。他的这些小曲在伏尔加河沿岸的各个城市被广为传唱。这首流传甚广的小曲就出自他的手：

我本贫寒，亦无美貌，

锦衣罗裳更难找。

仅仅为此，姑娘呀！

人世孤舟，无依无靠。

有一个叫特鲁索夫的行踪隐秘的人，也待我很好。他相貌堂堂，衣着讲究，手指像音乐家那样纤细。他经营着一间小店铺，处于城郊的船舶修造厂地区。铺面外边儿挂着“钟表匠”的招牌，但实际上是个销赃的场所。

“彼什科夫，你可别跟偷窃这种事沾上边儿！”他对我说，同时半眯起那双狡黠而又目空一切的眼睛，得意地捋着花白的胡须，“在我看来，你不是这条路上的人，你是个重精神生活的人。”

“重精神生活？那是什么？”

“那就是说，对任何东西都只抱有好奇，而不是羡慕。……”

这样说我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我羡慕过许多人，也羡慕过许多事，比如拿巴什金来说，我就对他那种独特的诗歌般的语调、奇妙的比喻以及出色的表达能力钦羡不已。我记得他是这样开始讲述一个爱情故事的：

“黑漆漆的夜晚，我独坐在偏僻的斯维亚日斯克的一家客店里，仿佛一只缩在树洞里的猫头鹰。那时是10月，秋风萧瑟，更兼丝丝细雨，那声音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鞑靼人绵声低唱着一曲哀歌，没有尽头：噢—噢—噢—呜—呜—呜—呜……”

“……正当这时她来啦，那么轻盈，那么明艳，宛如朝阳乍现时的云彩，但眼中流露出的纯洁无瑕却是伪装的。‘亲爱的，’她带着诚挚的语调说，‘我没有对不起你。’我知道这不是事实，但却相信了她的谎言。凭理智，我能看得一清二楚，但在情感上，我却无法承认她在欺骗我！”

他嘴里讲着，身体还随着有节律地晃动，眼睛微闭，不时用手轻轻按住胸口。

他的声音虽然低沉嘶哑，但每句话都透人肺腑，有点夜莺歌唱的韵味。

我也羡慕过特鲁索夫，他讲的那些西伯利亚、希瓦和布哈拉等地的故事都那么生动有趣，



而一谈起高级僧侣的生活，他又是那么冷嘲热讽、尖酸刻薄。有一次他还神秘地提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这位沙皇真是能干的君主！”

小说里常有一种“坏人”，他们在故事结尾时出人意料地变成了无私的英雄。我觉得特鲁索夫就该属于这类“坏人”。

遇上闷热的夜晚，人们就会渡过喀山河，坐在对岸矮树林里的草地上，一面吃喝，一面谈起各自的事情。无非是谈谈生活的复杂、人际关系的纠缠之类，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女人。他们一谈起女人，就显得愤懑、哀伤，有时又很感人，而且总是怀着一种窥视黑暗的心态——那黑暗充满了神秘可怕的事情。在星光寂寥的黑夜，在长满河柳的湿热洼地，我和他们一同度过了两三个这样的晚上。这里临近伏尔加河，由于晚间空气湿润的缘故，那些船桅上的灯火就像一只只金色的蜘蛛，在黑暗中向周围爬动，一簇簇火团和交织的光带闪现在漆黑的岩石河岸上，那是富裕的乌斯隆村的酒馆和民宅的窗户放射出的光芒。河水被轮船的轮片打得“噗噗”作响。驳船船队间传出水手们狼嚎似的吆喝声。不知什么地方有人在用锤子敲打着铁板，拖长了声音凄楚地唱起歌谣，抚慰自己忧伤的心灵，歌声把一抹淡淡的哀愁笼上人们的心头。

而更令人神伤的是静静地聆听这些人的轻言细语，他们思考生活，述说自己的心事，几乎并不留意别人说些什么。他们躺在或者坐在树丛里，吸着烟，随口喝点儿伏特加或啤酒，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之中。

“我遇上过这么件事儿。”黑暗中，有人趴在地上说道。

等到故事一讲完，大家纷纷表示：

“常有这种事啊，常能见到……”

“见过”，“经常如此”，“遇上不少啦”——听着这样的话，我觉得人们仿佛已经走到了生活的终点，什么都已经经历了，再无新鲜可言。

这种感觉拉开了我和巴什金、特鲁索夫的距离，但我仍然喜欢他们。如果沿着我经历的轨迹，我跟他们走上同一条道路那是很自然的。当我往上爬和念大学的梦想遭受打击时，我就更愿意和他们呆在一起。在忍饥挨饿、蒙受屈辱和烦恼郁闷的时候，我就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去侵犯“神圣的私有制”以及犯下其他罪行，可我却总被青年的浪漫主义从偏离的道路上拉了回来。那时除了人道主义的勃莱特·哈特的书和一些低级趣味的书之外，我也读过不少正正经经的书——正是它们催促着我去不断追求，虽然并不知究竟要追求什么，但那一定是比我所见过的一切都要重要得多、有意义得多的东西。

在这段时间，我交上了几个新朋友，有了些新的感触。叶夫列伊诺夫家旁边的空地常常引来一些中学生玩击木游戏^①。他们之中有一个名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的人让我产生了好感。

^① 击木游戏：俄罗斯人常玩的一种游戏，划地为城，用木棒把对方竖在城内的木棍击出城外，击出多者为胜。



他有着浅黑的皮肤，头发有些发青，像日本人，脸上长着雀斑，仿佛上面掺和进了火药末。他总是很快活，游戏玩得很灵活，谈吐也幽默风趣，似乎真有种天才的萌芽蕴藏在他体内。但他也像所有有天赋的俄罗斯人一样，守着这点天赋过日子，再没想过去拓展和提高。他的听觉很敏锐，又有很高的音乐鉴赏力，他自己也喜好音乐，能像艺人那样出色地演奏古丝理琴^①、三弦琴以及手风琴，但却对掌握更高级、更繁杂的乐器不感兴趣。他很穷，衣着褴褛。但那皱巴巴的破衬衫、那带着无数补丁的裤子和那破了洞的皮靴，却与他豪迈的气质、挺拔的身材、矫捷的动作和粗犷的作风很是相称。

他就像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或者刚刚刑满释放的囚徒。在他眼里，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美好的，带给他无限的快慰。他仿佛一支被点着的烟花，在地上蹦来蹦去。

他听说我生活困难、处境艰险，就提议让我搬到他那儿去住，还劝我准备准备，争取当个乡村小学教师。于是，我就搬进了这个古怪有趣的贫民窟——“马鲁索夫卡”，大概许多代喀山大学生都对这个地方非常熟悉。这是一所破败不堪的大房子，坐落在雷布诺里亚德街。它仿佛是被那些饥肠辘辘的大学生、妓女以及社会抛弃的无用者的幽灵，直接从房主手里夺过来的。古里的住所就在连接走廊与阁楼的楼梯的下面，那儿摆着他的单人床，另外还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摆在走廊尽头的窗户旁，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具了。走廊连着三个房间，有两间住着妓女，第三间里住着一个染有肺病的教会学院的大学生，研究数学的，又高又瘦，样子长得很可怕，头上和脸上长满了红褐色的硬毛，一身衣服肮脏而破旧，勉强能遮盖住身体，从衣服的窟窿里，暴露出他泛青的皮肤和嶙峋的肋骨，让人毛骨悚然。

他似乎只依靠吃自己的手指甲生存，把指头啃得快要出血了。他没日没夜地绘图呀、计算呀的，还不停地发出“咳儿”、“咳儿”的咳嗽声。妓女们都怕他，认为他是疯子，但是又同情他，常常放些面包、茶叶和砂糖之类的在他门口，他就像匹劳累的马一样呼呼地喘着粗气，把这一包包东西从地上捡起来，拿回屋去。如果妓女忘了或者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而没有送给他礼物，他就打开房门，冲着走廊沙哑地叫喊：

“面包！”

在他那双深陷于黑眼窝的眼睛中，闪烁着一种狂人般的自命不凡和高傲。一个驼背的小个子，有时会来看看他。这人跛了一条腿，肥大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头发花白，那阉割派^②教徒似的蜡黄脸上，挂着狡黠的微笑。他们把自己紧关在房里，沉默不语，安安静静地一连坐上几个小时。只有一次，时至深夜，这位数学家沙哑的咆哮声把我给惊醒了：

“照我看——这简直是监牢！几何学——是笼子，哼！是抓老鼠的笼子，哼！监牢！”

瘸腿的驼背尖着嗓子发出嘿嘿的笑声，并翻来覆去地重复着一些不明所以的词句，数学家

① 古丝理琴：古代俄罗斯的弦乐器，类似我国的古筝。

② 阉割派：又叫“修心派”，产生于俄国18世纪末，主张摆脱“世俗生活”，教徒必须实行阉割手术以绝欲。

突然怒吼起来：

“混账！滚！”

这位客人被赶了出来，气愤不已，在裹上宽大的破披风时，还不停地尖声叫骂。这时又高又瘦的数学家站在门口，面目狰狞，把手指插进乱蓬蓬的头发，沙哑地喊叫道：

“欧几里得^①是个白痴！白一痴……我确信，这个希腊人不如上帝聪明！”

他“呼”的一声关上房门，震得屋里什么东西哗啦啦地掉了下来。

后来没多久，我听说这个人是想用数学推理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可是在完成这一事业之前他就死了。

古里在一个印刷厂里做报纸校对的工作，上的是夜班，每夜能挣十一戈比。要是我抽不出空去挣钱，我俩每天就只能吃少得可怜的面包、茶和糖。可我没什么时间出去干活，因为我得学习。我正死啃各门学科，尤其在为那些死板的语法格式感到烦恼，我完全没法在这些僵硬的格式中填入新鲜的、灵活而质朴的现代俄罗斯语言。不过没多久，我就高兴地发现：现在学这些为“时过早”。即便我能考取乡村教师的资格，但受年龄的限制，我也不可能得到教师的职位。

古里和我同睡一张单人床，我夜里睡，他白天睡。通宵达旦的工作使他精疲力尽、面色发青、双眼红肿。他清早一回来，我就马上跑到小饭馆里去打开水——很自然，我们没有茶喝。然后我们就坐在窗前，吃面包、喝茶。古里会给我讲讲报上的新闻，读读化名为“红色多米诺”的酒鬼小品文作家的打油诗。我对古里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感到很奇怪，他对生活的态度，简直跟对待那个倒卖女人旧衣物兼做拉皮条生意的胖女人加尔金娜没什么两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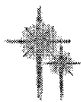
楼梯下的屋角就是他从这个胖女人手里租来的，可他无力支付房租，于是就靠给她说说笑笑、拉拉手风琴、唱唱动听的歌来作补偿。每当他用男高音唱起歌时，双眼就闪现出嘲弄的光芒。加尔金娜年轻时曾在歌剧合唱班呆过，很能领悟歌曲的意义。常常有许多感动的泪水从她那双厚颜无耻的眼睛中流出，淌过她这个酒鬼和馋鬼浮肿、铁青的面颊。她会伸出肥胖的手指抹去泪水，然后又拿出一条令人倒胃的手绢仔细擦那指头。

“哟！古里呀，”她赞叹道，“您真是个演员！如果您再漂亮点儿——我包您会走运！我安排过许多年轻小伙儿，去陪伴那些闲极无聊的女人呢！”

有一个这样的“年轻小伙儿”，就住在我们楼上。他是个大学生，一个毛皮匠的儿子。这小伙儿身材中等，胸膛很宽，大腿却异常细瘦，整个身体看起来像个锐角朝下的三角形，而且这个锐角还折断了一点——这位大学生的脚跟女人的一样小。他的脑袋也很小，深深地陷进了肩胛，上面胡乱竖着些马鬃般的红头发，一双碧绿的眼睛从惨白、缺乏血色的脸上凸起，显得灰蒙蒙的，没什么神采。

他背弃了父亲的意愿，像条游荡的野狗一样无以为生，费尽心机才终于念完了中学升入大

① 欧几里得（公元前315—前255）：古希腊几何学家。



学。后来他发现自己的嗓子低沉而柔和，是副很好的男低音，于是一心想着学习唱歌。

加尔金娜就利用这一点，把他塞给了一个富商太太。这位太太年过四十，一个儿子已经大学三年级，女儿也快中学毕业了。富商太太很瘦，胸脯扁平，直挺挺地像个士兵，脸上的表情总是无动于衷，冷漠得跟禁欲的修女一般，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深陷在两个黑黑的眼窝里，身穿黑色的连衣裙，围着旧式的丝绸头巾，一副镶着绿宝石的耳环总在耳朵下面晃来晃去。

她常在晚上或者清晨来找她的那位大学生。我见过好几次，商人太太像是跳进大门似的，步伐坚定地走向院子里面。她的脸色很吓人，嘴唇紧紧地闭成了一条线，眼睛瞪得老圆，带着绝望的神情望着前方，那样子看起来像个睁眼瞎。虽说她并不是个丑陋的女人，但你能明显地感到她体内有一股紧张的力量，仿佛是这股力量拉长了她的身子，扭曲了她的面孔，使她变得丑陋不堪。

“瞧！”古里说，“真是个疯婆娘！”

大学生对这位商人太太非常厌恶，总想避开她。商人太太却像一个冷酷无情的债主或者暗探一般，死死抓着他不放。

“我是个不能抛头露面的人，”大学生喝了酒后，后悔地说，“唉！我为什么要去唱歌？就凭这长相和这身材，人家就不可能让我登台表演，绝不可能！”

“你别再跟那婆娘纠缠不清啦！”古里劝他说。

“你说得对。只是我可怜她！我真没法忍受，但是又要可怜她。你要是知道她是怎么……唉！……”

我们其实早就知道，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们听见那个女人站在楼梯上，用颤抖的声音低声哀求：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的宝贝，噢——看在上帝的份上！”

这位商人太太控制着一家大工厂，拥有大量房产和车马，还曾向产科学校捐赠过数千卢布，而如今却像一个乞丐一样乞求男人的抚爱。

喝完早茶，古里就躺下睡觉，而我则到外边去干点杂活儿，晚上才能回来，那时古里又该去工作了。如果我能带回点儿面包、香肠或者煮牛杂什么的，我们就平分，他带走他的那一份儿。

我一个人闲下来时，就在“马鲁索夫卡”的走廊上转悠，看看我这些新邻居们过的是什麼日子。这幢房子真是拥挤不堪，宛如一个蚂蚁窝，到处弥漫着刺鼻的酸臭味儿，每个角落都隐藏着充满敌意的浓厚的阴影。这里从早到晚都嘈杂不休：缝纫机的响声从不间断，歌剧班的歌女们在吊嗓子，一个大学生用男低音哼着音阶，一个半癫狂的、发着酒疯的男演员手舞足蹈地高声朗诵对白，喝醉的妓女们有事没事地狂叫个不停。面对这一切，我心里不禁生出一个无法回答的疑问：

“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有一个秃脑门周围长着红头发的人，颧骨很高，肚子又大又圆却长着两条细腿，肥厚的嘴

唇包着一口马牙般的牙齿。因为这口牙齿，他得到了一个“红毛大马”的绰号。他常和那些食不果腹的年轻人混在一起。他跟他亲戚——辛比尔斯克的商人打官司已经打了三年，并逢人就说：

“我豁出性命不要，也得把他们彻底搞垮！让他们沦落街头，过上三年乞丐生活，然后，我就把判给我的财产统统还给他们，再对他们说：‘怎么样，混账东西们？现在领教我的厉害了吧！’”

“这就是你生活的目标吗，红毛大马？”人们问他。

“我这一生就只为干这件事儿，别的什么都不想！”

他每天都在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他委托的律师之间转来转去，经常在晚上乘着马车带回许多纸袋、蒲包和酒瓶。在他那间天花板坍塌、地板凹陷的龌龊房间里，把大学生、缝衣女以及所有想饱餐一顿、喝上点儿酒的人都邀请来，一块儿热闹热闹。“红毛大马”自己只喝甜酒——那种一旦溅到桌布、衣服或地板上就会留下洗不掉的紫红色污迹的甜酒。他喝醉了就叫喊起来：

“你们这些小鸟呀，我喜欢你们！你们都是些正正经经的人啊！而我呢，却是个恶棍，是条吃人的鳄、鳄鱼。我想吞掉我的亲戚，我一定要给他们致命的一击！真的，拼了命我也要让他们搞垮……”

“红毛大马”像是受了什么委屈似地眨动着双眼，醉汉的泪水顺着他难看的高颧骨面颊流淌下来，他伸出手掌擦了擦眼泪，又在膝盖上抹干——他那肥大的裤子上经常沾满了斑斑油渍。

“你们这算什么样的生活呀！”他大叫道，“饥饿、寒冷、衣衫褴褛——莫非这就是秩序吗？这样的生活会有什么希望？要是沙皇了解到你们的生活……”

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花花绿绿的钞票，冲着大家喊：

“嘿！谁需要钱？兄弟们！都拿去吧！”

歌女们和缝衣女们争先恐后地想从他毛茸茸的大手里夺走那些钱。他却哈哈大笑起来，说道：

“这不是给你们们的，是给大学生的！”

可大学生却并不去拿钱。

“去你的几个臭钱吧！”毛皮匠的儿子生气地叫道。

一天，他自己喝醉了，带了一把揉成硬团的十卢布钞票到古里这儿来，把钱往桌上一扔说道：

“这钱，你要不要？反正我不要了……”

他躺在我们的单人床上，大嚷大闹，还哭了起来，我们只好给他浇水、灌水，让他醒醒酒。等他睡了之后，古里试图把钞票一张张展开，但却根本没有办法，它们被揉得太紧了，必须先用水润湿，才能把它们分开。



他房间的窗户紧对着隔壁的石墙，屋里烟雾缭绕、肮脏不堪、狭窄憋闷再加上人声嘈杂，这一切无不让人厌恶。“红毛大马”却比谁都叫嚷得更响。我问他：

“为什么你不去住大酒店，而偏要上这儿来呢？”

“好兄弟！就图个心头痛快啊！跟你们在一起，我的心是热乎乎的……”

毛皮匠的儿子立即赞同道：

“‘红毛大马’说得对！我也有同感。要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早完啦！……”

“红毛大马”央求古里道：

“弹起你的琴！唱唱歌吧……”

古里坐下来，把古丝理琴放上膝头，边弹边唱：

红红的太阳啊，

快升起来吧！快升起来……

他的歌声轻柔舒缓，牵动着每个人的心。

房间里安静下来，大家都沉醉在那忧怨的歌声和缥缈的琴声之中。

“唱得太好了，小伙子！”那个倒霉的、陪伴富商太太的大学生叫了起来。

在住在这个大房子里的形形色色的人中，古里最具有营造欢快气氛的才智，简直就像神话里的善神一样。他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能讲出巧妙的笑话，会唱优美的歌曲，敢对陈风陋俗大肆嘲讽，还敢捅破生活中的大谎言，这一切无疑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光明。他刚过二十岁，外表还像个孩子，但在这所大房子里的人们看来，他是排忧解难的顾问和好帮手。善良的人都喜欢他，坏蛋则害怕他，甚至那个老岗警尼基福雷奇，也常挂着狡猾的微笑跟他打招呼。

“马鲁索卡夫”这所大房子，是上山的要道，连接着雷布诺里亚德和老戈尔舍奇纳两条街。出我们住所的大门不几步，就是尼基福雷奇的岗亭，它就安然地坐落在老戈尔舍奇纳街的拐角处。

他是我们街区的警长，高高瘦瘦的个儿，胸前总挂满了奖章。老头儿的脸显得挺精明，笑容也很友善，可一双眼睛却总闪着狡黠的光亮。

他密切地注意着我们这所鱼龙混杂、吵吵闹闹的大房子。每天，他都会穿得一本正经地上我们这儿巡查好几次。他走路不紧不慢，从这个窗口望到那个窗口，那样子仿佛是动物看守员在检查笼子里的野兽。今年冬天，他从一个房间里把退役的独臂军官斯米尔诺夫和士兵穆拉托夫抓走了。他俩都曾参加了斯科别列夫统率的阿哈尔——帖金远征军，还获过圣乔治十字勋章。佐布宁、奥尔相金、格里戈里耶夫、克雷洛夫和另外一些人也被逮捕了，罪名是企图建立秘密印刷厂。穆拉托夫和斯米尔诺夫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在星期天去城里的克柳奇尼科夫印刷厂偷铅字，就为这事他们被捕了。另一天夜里，那个曾被我称为“活钟楼”的郁郁寡欢的高

个子，也被宪兵们从“马鲁索夫卡”抓走了。古里第二天早晨听说这一消息后，气恼地抓乱了他的黑头发，对我说：

“马克西莫维奇！简直太糟了！快去！老弟，得赶快……”

他跟我说明了应该上哪儿去，又添上一句：

“留神，千万小心！那里没准儿有暗探……”

我对能接到这个秘密任务而兴奋异常，像雨燕似地飞快地跑到了船厂区。我走进一家阴暗的铜器店铺，看见一个有着碧蓝眼睛和鬈发的年轻人，正在给一口平底锅镀锡，但他的样子却并不像个工人。屋角的老虎钳旁，一个把白头发用皮带子扎起来的小个儿老头，正忙着磨制铜活塞。

我问铜匠：

“你们这儿有活干吗？”

那老头儿没带好气地答道：

“我们有，但没有给你干的！”

那个年轻人瞥了我一眼，又埋头镀锅。我用脚轻轻碰了碰他的脚，他一下子又惊又怒地抬起蓝眼睛盯住我，手里抓住锅把，似乎要把锅朝我砸过来的样子。可他见到我对他使眼色，又平下心来，对我说：

“走吧，走吧！……”

我又给他使了个眼色，才转身出了门，站在街上。鬈发青年也直起腰跟着走了出来，一言不发地盯着我，兀自点起了一根烟卷。

“你是吉洪吧？”

“嗯，不错！”

“彼得被抓走了。”

他气愤地紧锁眉头，两眼不住打量着我。

“哪个彼得呀？”

“高个子，长得像教堂助祭。”

“嗯？”

“就这些。”

“彼得，助祭，这跟我有什么关系？”铜匠问道。他的语气让我更加确信，他绝不仅仅是个铜器工人。回到大房子时，我很有些自鸣得意，因为我完成了别人交给的任务。这是我头一次搞“地下”活动。

古里·普列特尼奥夫和那些人来往甚密。我向他提出过加入他们组织的请求，可他却回答：

“老弟，你还太小！先好好学习吧……”

有一次，叶夫列伊诺夫介绍我去见一个神秘人物。这次会面安排得非常小心，使我预感到



将要发生的是件非同寻常的事。叶夫列伊诺夫把我带到城外的阿尔斯科耶波列，一路上千叮咛万嘱咐要我注意安全，还要求我对此事绝对保密。随后，他四下张望了一会儿，指着在远处荒地上慢慢走动的一个小小的灰色身影，对我低声说：

“就是他！跟上去吧！他一停下来，你就对他说：‘我是新来的……’”

秘密活动总是愉快的。可是这次的会面却令人感到可笑：在明晃晃的阳光下，一个人像根灰色的野草一般独自在荒野里游荡，其他再没有什么，我直到墓地门口才赶上他。原来是个脸又瘦又小的青年，两只眼睛圆圆的跟小鸟一样，却流露出严肃的神色。他穿着一件中学生的灰大衣，原先的浅色扣子已经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几个黑色的骨制纽扣，学生帽又旧又破，还保留着校徽的痕迹。总的说来，他身上过早地显露出了什么，似乎是急于想表现出成熟的姿态。

我们坐在墓地中间的灌木丛里。这个人说话枯燥乏味，我对他整个人都没什么好感。他一本正经地问我读过些什么书，然后要求我加入他领导的小组，我同意了，接着我们就分了手。他先离开，不住地谨慎地朝空旷的荒野四面张望。

另外还有三四个青年也参加了这个小组，我是组里年纪最小的，也从未读过什么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著作和车尔尼雪夫斯基^①所作的评注。我们聚会的场所是一个叫米洛夫斯基的师范学院大学生的家，他后来用叶列翁斯基作笔名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但在写完五本书后，他就自杀了——那样轻易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如我见过的许多人一样。

这个师范学院的大学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思维不太活跃，说话小心翼翼。他的住所就在一幢肮脏楼房的地下室。为了保持“身心平衡”，他每天都要干点细木工活儿。跟他呆在一起，我觉得很没意思。穆勒的著作也没什么吸引力，因为很快我就发现这些经济学原理其实我早已了如指掌，凭借我亲身的经历就能直接领会。我认为把这些道理用艰涩的语言写成一大本书简直有些多此一举，只要是为“他人”的幸福和安适付出过努力的人，对这些道理都很清楚。这对我来说实在不是件轻松事——在这个弥漫着鲛胶臭味的地下室里，看着小虫子在脏兮兮的墙上爬来爬去，就这么呆坐上两三个钟头。

有一次，小组教师没按时来上课，我们都以为他不会来了，于是去买了一瓶伏特加和一些面包、黄瓜，搞出一次小小的酒宴。突然，老师的灰色裤腿从地下室的窗口一闪而过。我刚把酒藏到桌下，他就进来了，开始讲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些高深见解。我们就跟木头人似的，一动不动地坐着，生怕有谁一不小心踢翻了酒瓶。结果是老师把酒瓶给碰倒了，他只朝桌子底下看了看，什么也没说。哎！他要是冲我们大发雷霆倒好些呢。

他那张沉默、严峻的脸和那双恼怒得半眯起来的眼睛，都让我感到坐立不安。我偷偷望了望同志们，他们也都一个个羞红了脸。虽然并不是我提议买酒的，但我总觉得有种负罪感，对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写过批评文字。



老师怀着深深的歉意。

读书让人百无聊赖，我真想到鞑靼区去，那里的人善良纯朴，过着特殊的纯净生活，讲一口好笑的跑调的俄语。每天傍晚，他们在来自清真寺高塔上的伊斯兰教士奇怪声音的召唤下，到清真寺作礼拜。我想，鞑靼人的生活属于另一个世界，属于那个我不熟悉、也不喜欢的世界。

我向往的是伏尔加河上劳动生活的音乐，那种音乐令我沉醉至今。我首次感受到劳动中美妙诗意的那一天，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一艘装载着波斯货物的大驳船，在喀山附近触礁搁了浅，船底被撞出了窟窿。装卸班的工人带我去卸货。那时正值九月，从上游来的风吹得呼呼直响，一层又一层波浪从灰蒙蒙的江面上翻滚而起，又被狂风打成碎沫，冰凉的秋雨不住洒向大江。这个装卸班大约有五十人，他们身上披着破草席或帆布，一个个神色黯然地蹲坐在空驳船的甲板上。拖着空驳船的是一艘小火轮，不住地喘着气，向风雨中吐出一条红色火舌。

天色晚了。深灰色的湿润天空变得昏暗凝重，朝河面低垂下来。装卸工们七嘴八舌地抱怨着，咒骂寒雨，咒骂狂风，也咒骂生活。他们在甲板上懒散地走来走去，想驱驱寒气和湿气。我有一种感觉：这群昏昏沉沉的人没法干活，也抢救不出那些正在沉没的货物。

深夜时，船才驶到了事故地点。人们把空驳船和那条搁浅大驳船紧紧系在一起。装卸班的班头是个狡猾的老头儿，脸上生满了麻子，鼻子和眼睛长得像老鹰，嘴里常常不干不净的。他从秃头上摘下湿漉漉的帽子，像女人似地尖声叫道：

“伙计们！祈祷吧！”

黑暗中，装卸工们在甲板上聚成了黑压压的一片，像一群狗熊似地发出呜呜的闷响。班头首先做完祷告，又尖声喊道：

“点上灯！小伙子们，露上一手！伙计们好好干！上帝保佑，动手吧！”

于是，这群愁容满面、萎靡不振、被雨水淋透的人开始大显身手了。他们像是上战场战斗一般，飞奔上那艘正在沉没的大驳船的甲板，跳入船舱——连声呼喊着，叫着嚷着，讲着笑话。一袋袋大米，一包包葡萄干，一扎扎皮革和鬃毛羔羊皮，像鸭绒枕头似的一个个轻飘飘地从我身旁掠过。那些矮壮的身影来回不住地飞跑，以呼嚎、喊叫和叱骂相互鼓励着。真让人难以置信，这群人刚才还在垂头丧气地抱怨生活、抱怨风雨和寒冷，可现在干起活儿来竟如此兴高采烈、生龙活虎。这时雨更大了，天更冷了，风也愈发张狂，吹开了人们的衬衫，把衣襟吹卷到头上，露出了下面的肚子。六盏灯笼微弱的光芒穿透了这潮湿的黑夜，照出一个个来来回回的黑色人影，驳船的甲板被踩踏得咚咚直响。他们那股气势，仿佛是渴求着劳动，仿佛早就期待着享受传递四普特重的米袋和扛着大包比赛乐趣的这一天到来。他们干得那么欢快、那么浑然忘我，就像小孩子沉迷于一种游戏，大概除了拥抱女人之外，再没有比这更甜美的事了。

有一个穿着紧腰长外衣、满脸胡须的高个儿大汉，浑身被淋得透湿，看起来像是货船的老